

STAT



平
出
版

STAT

東方紅

編 河 天 陳

社 版 出 原 平

九 四 九 一

東方紅（民謠）

東方紅，太陽昇，
中國出了毛澤東，
他爲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邊區紅，邊區紅，
邊區地方沒窮人；
有些窮人選移民，
挖斷窮根要翻身。

泰山低，五嶽高，
毛主席治國有勁勞，
邊區辦的呱呱叫，
老百姓來頌唐堯。

生產變工搞的好，
邊區地方沒強盜，
夜不閉戶狗不咬，
毛、朱同志有功勞。

李增正
李有源

這是很著名的歌，
尤其第一段「東方紅，
太陽昇」會流行陝甘寧
晉綏及張家口等地。爲
葭縣城關區三鄉農民李
增正及其叔李有源合作
，二人皆葭縣有名歌手
。歌中所指「移民」爲
一九四三年陝甘寧邊區
政府號召邊區北部的貧
民移往南部開荒生產過
好光景，因北部地少人
多，南部則荒地多人口
少。

目次

一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	郭沫若
二	毛澤東路線的發展………	史特朗
三	論毛澤東思想………	艾思奇等
四	偉大的毛澤東………	李山
五	毛澤東自傳………	史諾筆記
	少年時代	
	長沙時代	
	革命的前奏	
	國民革命時代	
	新政權運動	
	紅軍之成長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0/12/08 : CIA-RDP82-00457R004900620012-1

獻
給

毛澤東
旗幟下的
新青年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0/12/08 : CIA-RDP82-00457R004900620012-1

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

郭沫若

今天的青年朋友們幸運了，我誠懇地向你們祝福。

很多年前以來，我就作這樣的夢想：凡是青年朋友都應該無拘無束，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地發展下去，像自由空氣裏的森林那樣，有充分陽光和空氣，充分的養料和水分，自然而然長成爲繁榮大木，棟樑之材，今天這夢想，竟很快地便可以全部實現了。

束縛我們青年，奴化我們青年，屠殺我們青年的反動勢力——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聯軍，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上很快便整個被我們擊潰了。中國人民來了一個大翻身。中國青年也從此脫掉一切腳鐐手銬，可以暢暢快快的做人了。

青年們生在這樣的新歷史開幕的大時代，真是值得祝福。我們千萬不要辜負了這個時代，千萬不要在幸福的歡樂中陶醉了自己，應該保持着十分的清明沉着，友愛，勇敢，來認識而完成青年所負的歷史使命。

怎樣認識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呢？誠心誠意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體驗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政策和號召，建立一個堅強的革命的人生觀，這是唯一的途徑，而且是每一個人所必須經歷的途徑。有了這種基礎，然後我們才能具備一個健全的靈魂，我們才能掌握到各種技術而且實地爲人民服務。

無論是精神生產也好，物質生產也好，技術自然是必須的，然而運用技術的還是人，運用者如不健全，則被運用的技術，愈精巧時害人的成分愈大，故必須是革命家，然後才能掌握革命技術，必須

有澈底的人民意識者，然後才能成為忠實的人民勤務員。

這些話在今天，應該是已經成為革命的常識了。尤其青年朋友們可能個個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透澈。但知道了並不能算事，一定還得要求我們做到。不僅是做到，而且還須做好。這却不是容易的事，就讓我們一輩子努力去做，都未必一定做得恰到好處。

總之，我們努力吧！不要浮誇，也不必氣餒，我們實事求是地努力吧！努力學習，努力體驗，努力工作，不僅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且要把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種神聖的使命，切實地擔負起來，使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迅速地得到勝利，迅速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

今天的青年朋友們幸福了，我誠懇地向你們祝福。今天已經有了很好的客觀環境讓你們自由發展，你們千萬不可辜負了這個時代，應該加倍的努力，有了很好的客觀環境，必須有很好的主觀努力和它配合。我們永遠地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奮勇前進吧。

二、毛澤東路線的發展

史特朗

『毛澤東路線』是慢慢地發展出來的。

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長陸定一談過：『中國共產黨永遠是英勇的，但領導方面在取得經驗之中犯過許多錯誤。這些錯誤的代價都很大，因而也就很深刻的教育了我們避免以後再犯這類錯誤。在大革命時我們有黨員五萬人，在蔣介石反革命和進行屠殺以後，降到一萬人；江西蘇維埃時代又上昇至三十萬人；長征以後降到四萬人。我們的紅軍在內戰初期達到三十萬人，長征以後降到四萬人。這些損失的造成都是毛澤東的領導發展以前，由於我們的領袖們政策錯誤的結果。今天我們已有二百二十萬黨員，一百五十萬以上的正規軍，和四百萬農村的武裝民兵。』

中國共產黨最初六年是以陳獨秀為領導，陳為北平的一個教授，又為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僅僅有十二個代表，而在全國則僅有幾十個黨員。一九二三年共產黨藉與孫中山的協議，整體加入國民黨，但同時仍保持他們自己的組織。其特殊的任務就是組織工人和農民。一九二五年時，計有一萬五千名黨員。

據共產黨人現在看起來，陳獨秀的錯誤在於『向資產階級屈服』，就是對蔣介石屈服。當國共聯軍仍在廣州，尚未進行橫越中國以奪取權力的時候，蔣即開始進攻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三月蔣拘捕一個戰艦的艦長，因其為共產黨員的原故，並且宣佈稱所有軍隊中高級軍官及政治工作人員為共產黨人者，必須撤職。現在共產黨人認為，在那個時候，就應該確定他們的立場。那時他們已經很成功地幫助組織國民黨的武裝部隊，因此廣州的四個軍裡面，有三個却大部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甚至在第四個

軍裏面也有共產黨的同情份子。很多共產黨人希望反對蔣介石的清黨，但陳獨秀屈服了。三個月以後，陳獨秀又向國民黨五月五號決議案屈服，該案中決定從國民黨中央及一些黨的組織的領導位置上驅逐共產黨人，而這些國民黨組織有很多是由共產黨人組織起來的。

陳氏稱，「這一政策就使得共產黨人沒有準備來抵抗蔣的反革命，這一反革命是以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屠殺上海工人開始的」但在武漢時仍有一個機會；經過一九二七年整個夏天，武漢政府裏仍有一半以上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與共產黨合作。陳獨秀仍然退却。他允許工人糾察隊在武漢三鎮解除武裝。他反對土地革命；此事的發生，與他的願望相違。當長沙軍閥建立軍事獨裁時，有十萬農民武裝包圍該城，一切都準備好了用武漢的名義予以收回，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員被這一人民力量所嚇倒了，在他們要求之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即下令將農民武裝解散。共產黨這一後退就使得工人農民失却領導，而使七月武漢反革命成為可能。

共產黨現在認為另外一個錯誤就是在八月一日南昌暴動以後所發生的。「我們在那裏有很強大的軍隊，我們應該堅守南昌至少也應該在南昌附近的鄉村中成立很強的根據地。……但我們沒有經驗，我們不認為可以拿得住那個地區。因此我們南向廣州出發，對於革命的誕生地懷着一種老家的情緒。但在汕頭附近劇烈的戰鬥裡我們被打敗了，軍隊被驅散和遭到消耗，當朱德向湖南移動和毛澤東匯合時，團聚於他週圍的僅有一千人。」

在武裝瓦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了。陳遂先後被數次後繼人所代替。今天共產黨的看法是：「陳獨秀錯誤以後，我們又濫得太向左邊，犯了另一方面的三次錯誤。」

這些錯誤的第一個，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完全糾正。這個左傾路線，由於看到幾個農村地方起義的勝利的就說中國的革命的性質是「不斷革命」，因而把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說中國革命的形勢是「不斷高漲」，因而否認大革命的失敗，於是在許多地方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這一時期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起義，仍認為

是正確的：因為這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退兵時之一戰，舉起了革命的旗幟和向全國人民宣佈了我們的綱領。」

隔了兩年又兩個月之後，一九三〇年六月，左的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國共產黨，到八月才被推翻。這時候，鄉村中的游擊戰爭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之下有了發展：中國的反動軍閥之間也爆發了戰爭。這樣，左傾的領導者就以爲到了「全國大幹」的時候，他們嘲笑毛澤東和朱德所建設起來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和游擊戰爭，以爲那是太落後和太不足道了，他們要求紅軍以正規作戰奪取像武漢那樣的大城市；並計劃在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在革命的性質問題上，他們認爲，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因此就規定了一些不合宜的過左的政策。

第二次的左傾錯誤的領導被糾正後，只隔了五個月，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領導落到一批教條主義的黨員們的手裏。他們有詳盡的引証馬克思，列寧，斯太林的能力，但他們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就比以前任何一次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們懂得更少。照他們說，第二次的左傾錯誤，不是左傾而是「右傾」，正確的路線應當是比它更左就是所謂「純粹的無產階級的路線」。他們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句做外衣，把這個極左的錯誤路線發展起來，並維持了四年半之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長征中舉行的貴州省黨代會，才實際上被糾正過來。

陸定一在表示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時說：「教條主義者的領導給了我們十分重大的損失」，「當我們在江西時，反對蔣向日本投降的福建將領，向我們提出聯合，提出結成統一戰線，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太正統了，以致不能和那個資產階級者建立統一戰線，這樣就喪失了取得勝利的機會」。

共產黨今天認爲在江西能採用正確的策畧，長征亦「可以避免的」，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甚至會說「長征」是個錯誤的結果，在長征中途，中國共產黨改變了領導，毛澤東的領導使長征的終結，成爲一個勝利，一個軍事奇蹟，成爲他們歷史上英勇的一部份，決定了他們以後一切發展的輪廓，這種以後一切發展的中心就是延安邊區（即陝甘寧邊區——譯者），他們從延安發展至華北的一大部分和滿洲，

延安邊區是乾燥的，經濟上落後的地區，這種情況在一開始時就阻礙了每一種努力，在江西的一塊遼闊根據地上，以福州為海口，是否可做更多的事呢？這是一種無益的臆測，共產黨員並不耽於此種臆測中。

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及其軍隊從江西的三十萬人跌到長征結束時的四萬人。

在這些年份中以及這些損失中，「手澤東路線」發展起來了，它是一個在烽火中鍛鍊和挫折中磨礪出來的武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創始人之一；是湖南農民革命的領袖，這個農民革命於一九二七年被陳獨秀命令解散，後來，毛澤東把他的「農民自衛隊」的殘部和朱德軍隊的同樣被擊毀了的殘部結合起來，他成為這些發展緩慢的農村游擊隊的領袖。作為江西蘇維埃政府的主席，毛澤東對於實際事件的意見發生了影響，但黨的政策之上層領域仍舊為那些教條主義者所保有，毛澤東那時除了中國的農民外知道什麼呢？

今天共產黨的幾種行動是從那時毛的理論決定的。對解放區的困難名稱搞不清的人們，這種名稱常常包括二、三、或四省的名字，一定懷疑什麼情況使共產黨地區如此經常更改老的省界。這不是實際情況使它更改的，而是主動地更改的。十八年前，悲觀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已完了；冒險主義者渴望奪取大城市時，毛澤東說建立蘇維埃區域是可能的，但必須建立在山區中，在那裏各省的省界會合。

在這裏，毛澤東離開歐洲型而根據他自己對於中國鄉村的了解來行動。在歐洲，各國家間的界線被防衛着，它們不是發動新政權的地區，在中國，當你離開一個軍閥的都城，他的力量便減少了。在各省軍閥之間的接合部，遠離他們力量中心的都市的邊界——「編者」，中國共產黨組織農民進行自衛。這樣建立起來的某些區域持續了十八年。

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亦從那個時期決定的。在朱毛的結合中，這種結合產生了共產黨軍隊，朱德

是正確的：因為這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退兵時之一戰，舉起了革命的旗幟和向全國人民宣佈了我們的綱領。」

隔了兩年又兩個月之後，一九三〇年六月，左的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國共產黨，到八月才被推翻。這時候，鄉村中的游擊戰爭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之下有了發展：中國的反動軍閥之間也爆發了戰爭。這樣，左傾的領導者就以爲到了「全國大幹」的時候，他們嘲笑毛澤東和朱德所建設起來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和游擊戰爭，以爲那是太落後和太不足道了，他們要求紅軍以正規作戰奪取像武漢那樣的大城市；並計劃在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在革命的性質問題上，他們認爲，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因此就規定了一些不合宜的過左的政策。

第二次的左傾錯誤的領導被糾正後，只隔了五個月，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領導落到一批教條主義的黨員們的手裏。他們有詳盡的引証馬克思，列寧，斯太林的能力，但他們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就比以前任何一次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們懂得更少。照他們說，第二次的左傾錯誤，不是左傾而是「右傾」，正確的路線應當是比它更左就是所謂「純粹的無產階級的路線」。他們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句做外衣，把這個極左的錯誤路線發展起來，並維持了四年半之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長征中舉行的貴州省黨代會，才實際上被糾正過來。

陸定一在表示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時說：「教條主義者的領導給了我們十分重大的損失」，「當我們在江西時，反對蔣向日本投降的福建將領，向我們提出聯合，提出結成統一戰線，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太正統了，以致不能和那個資產階級者建立統一戰線，這樣就喪失了取得勝利的機會」。

共產黨今天認爲在江西能採用正確的策畧，長征亦「可以避免的」，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甚至會說長征「是個錯誤的結果」，在長征中途，中國共產黨改變了領導，毛澤東的領導使長征的終結，成爲一個勝利，一個軍事奇蹟，成爲他們歷史上英勇的一部份，決定了他們以後一切發展的輪廓，這種以後一切發展的中心就是延安邊區（即陝甘寧邊區——譯者），他們從延安伸展至華北的一大部份和滿洲，

是個有經驗的軍事人物。但這是毛——（他曾為湖南某學校教員），他的銳利分析補充了朱德的軍事知識，並發展了他們聯合戰畧的理論，就是這個理論共產黨人渡過了反對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十八年戰爭。

要點如下：「當敵人來的時候，他們是比我們強的。如果我們作戰，並且被擊敗，我們就輸了。如果我們作戰，並且僅僅擊退敵人，也不算勝利。我們所認為勝利；是我們包圍敵人，而全部殲滅之；虜獲其槍械彈藥及人員。」

「所以當敵人來的時候，叫他們來好了。如果他們要這個城，要那個城；拿去好了。我們的部隊要退避。分散到敵人找不到的地方。我們從各地的農民得到情報。我們只在優勢條件下，才進行作戰。每一個這種戰鬥必須時間短，而且帶決定性。我們必須每戰必勝，當敵人的有生力量變到消滅時，我們就進入反攻——但仍是很謹慎的——拿回城鎮和失地。」

這種戰畧是和傳統的戰爭如此的不同，以至有許多外國軍事專家斥之為「游擊戰」。然而，用這種名詞很難解釋一九四七年正月在山東對蔣氏最精銳的部隊三個半旅的包圍戰，據報七千敵人死傷，二萬人連同武器一齊被俘。共產黨人對於他們的較小的地方游擊部隊與他們的正規軍是分得極清楚的。雖然正規軍在必要時可以化為小組。這些小組是靈活的；但紀律良好，並且可以很快的再集合在一起。這是一種戰略是專為了在人民全心全意支持部隊的地域中的自衛戰所製定的，對於侵畧戰是不適用的，對於其他與優勢的外來敵人戰鬥的殖民地民族是有益的參攷。

長征的殘酷的考驗使毛澤東升到領導地位。「沒有他的領導，長征的完成會成為不可能的」，共產黨人今天都這樣說。但只是到了十年以後，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第七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在八年抗日戰爭後，毛澤東才正式被選為主席。中國共產黨，那時在他的領導下，已發展到擁有一百二十萬黨員。在所有他們那敵後各遼遠的組織中，進行了兩年的對黨史的討論。其成果在七大中具體表現出來，他們稱七大是「團結與勝利的全國代表大會」。陸定一說：「當時存在着一種極大收穫之感。即分

散在許多戰線上的道路，達到一個共同的估計」。

討論了兩年之後是在七大會上，毛澤東才終于被選為主席，雖然他在十年前就早已被認為領袖了。是在七大會上，許多過去領袖們的政策，才這麼徹底的被檢討——對他們使中共遭受的損失，加以長時間的討論。如果毛氏不參預來救他們，他們恐會受到懲罰，從中央委員會或從中國共產黨中被淘汰出去。他說：『那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們，不管是多麼嚴重，如果他們真心誠意的承認了錯誤，分析了他們的錯誤：并得到經驗，比較沒有受過放驗的人仍是較好的領導者』。

三、論毛澤東思想

艾思奇等

「……說到這裡，我們就必須提到我們黨在這三年的偉大進步。我們黨在這三年，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要更多成就的工作。對全國說，我們黨兩度制止內戰的危機（皖南事變和這次進攻邊區的陰謀的揭露），堅持了敵後最艱苦的游擊戰爭，堅強了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撐持，因此穩定了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情緒和意志，維繫了大後方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對國際說，我們黨不僅預見三年來的國際事變，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義必趨死亡，民主國家必然勝利的前途。並且也使同盟國家認識了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抗日根據地，才是真正反攻日寇大陸心臟的力量和基地。對全黨全軍全邊區說，我們黨領導的整風運動，收獲了從來沒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績，精兵簡政收獲了力量上鞏固的成績，統一領導收獲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績，擁政愛民收獲了黨政軍民聯成一體的成績，發展生產樹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後審查幹部使我們黨達到了空前的鞏固和團結。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澈頭澈尾的証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証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

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綫。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綫，就是中國的布爾維希的路綫。

同志們，我們有了這樣的黨，不應該驕傲麼？我們有了這樣的領袖，不應該驕傲麼？但是國內有些反共份子，竟敢無恥高叫「取消」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共產黨，難道他們還不是日寇漢奸的第五縱隊麼？他們早不提，遲不提，偏偏在現在公開提出，他們故意說共產國際解散了，共產主義便不適用於中國，中國共產黨便失掉靠山，中國共產黨內部便要分裂了。他們這種鬼話有人相信麼？

共產主義是不適用於中國麼？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可以適用於全人類，可以改造全世界，為什麼中國會獨闕除外？反共份子所以要這樣胡說，就是因為他們最怕我們用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在中國人民面前解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諸現象，指出中國革命的真正道理。我們敢正告反共份子，共產主義不但適用於中國，而且他經過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運用和發展，已經和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和中國人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而成為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義了。誰要來搖撼他，誰就會自趨死亡。

中國共產黨是失掉了靠山麼？不錯，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不少的指示和幫助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靠山却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從中國勞動人民中生長起來的。他是存在在中國人民中間。我們黨是羣衆的黨，在今天已有八十萬的黨員，五十萬的軍隊，並與近萬萬的羣衆在實際的戰爭的生活中血肉相連起來了。中國民族需要他，中國的人民需要他，誰能取消他、解散他？我們敢正告反共份子，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會取消，而且要永久的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義走向死亡的道路，應該取消、應該解散的倒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國特務組織。

中國共產黨內的內部是要分裂麼？反共份子一年到頭，日以繼夜的幻想我們黨會像他們一樣分成

許多派系，於是捏造出許多謠言蜚語，想來中傷我們。殊不知我們黨的組織是統一的，是基於主義的信仰，階級的覺悟和革命的鍛鍊，並有自覺的紀律來鞏固他，決不同於國民黨，可以派別分歧，毫不統一。不錯，我們黨內曾經有過不少的錯誤，有過不少犯錯誤的不良份子，但是我們黨正是在反對和克服這些錯誤的鬥爭中長成起來，黨的思想才趨於一致，黨的組織才趨於鞏固。犯錯誤能悔改的人，自然會與黨的正路趨復歸一致，屢犯不肯改的人，自然會被黨所唾棄。陳獨秀、張國燾還不是中共的創始者麼？但當他們怙惡不悛。為黨所開除，那時候他們何嘗能分裂黨，反而使黨更加鞏固了。這三年我們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經過整風學習，幹部審查，已達到空前鞏固的程度，我們敢正告反共份子，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會因為你們的造謠中傷而分裂，反而會因為你們的陰謀破壞而更加鞏固，更加團結，更加鞏固起來。我們想抗戰愈艱難，革命愈向前發展，分裂的倒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會別有所在，並且這種例子歷史已不止一次重複了。……」（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的演講）

「……我們警告那些企圖消滅共產黨的人們：共產黨是破壞不了，消滅不了的。因為他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只要有中國人民，就會有中國共產黨，他與中國人民是不可分離的。他的馬列主義的力量是偉大的，他有八十萬黨員，五十萬軍隊，特別是從廿二年奮鬥中，得到了一個精通馬列主義的英明的領導毛澤東同志，他是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勝利的旗幟。……」

「……一切忠實的共產黨員們，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與實際，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去反對黨內一切公開的、暗藏的投降主義，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康生：「搶救失足者」）

「……我們有值得保衛的東西，有二十二年英勇奮鬥歷史的偉大的黨，給全國人民指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光明大道的黨，為全國人民所熱愛的黨，唯一能救中國的黨，」我們有從游擊隊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強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們有親手在艱難困苦中締造的今天已經人民安居樂業，衣食的邊區，有在血戰中從敵人手中得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有由我們流血犧牲而獲得偉大的抗日戰爭

底已經奠定的勝利基礎，有我中華民族的前途及萬世子孫的命運。

我們有保衛力量，我們有八十萬黨員，我們有五十萬在黨領導下的軍隊，我們有鞏固的根據地，我們有二十二年鬥爭的經驗，我們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有無數身經百戰的幹部，最後異常重要的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他總是在最艱難困苦中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我們有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

軍事威脅不足以征服共產黨，挑撥離間不足以分化共產黨，相反我們將更親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在毛澤東旗幟下戰鬥並且取得勝利！……」（博古：「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

「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解放民眾。我們在政權上的一切採擇，全部以此為出發點，以此為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個黨不能替民族替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是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為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國事是國家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見，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這是我們共產黨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陳伯達：「閻錫山批判」）。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結合的過程，是根據了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工農羣衆廣大人民的鬥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和廣大的人民在一起，發動人民積極鬥爭的精神，並以「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從羣衆中學取領導革命的知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的知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者決不以唯心主義的「先知先覺」自居，決不把人民簡單的看做不知不覺的「阿斗」，相反地，共產黨人知道廣大人民羣衆的偉大的積極與創造

力，只有他們，只有人民才是一切革命的真正主人翁。同時，共產黨人又知道，人民由於長期處在反動統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後，而人民的意見與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政黨，自己的領袖、自己的先鋒隊；這種政黨、先鋒隊，不是高踞人民之上，而是處在人民之中，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向人民學習，又教育人民。這樣的政黨、領袖、先鋒隊，就是中國共產黨。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掌握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知識，才能自誕生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連續不斷地進行了三次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才能堅持抗戰到今天，並在各根據地建立了真正新的三民主義的中國。

這一切事實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够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有人民的革命哲學。……（艾思奇：「中國之命運」的愚民哲學）

四、偉大的毛澤東

李 山

詳細的檢討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最大的錯誤，不在於陳獨秀的「向資產階級屈服」；也不是在於一九三〇年六月的「盪得太左」，而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領導落到一批教條主義的黨員們的手裡，他們有詳盡的引証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能力，但他們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就比以前任何一次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們懂得更少。照他們說，第二次的左傾錯誤，不是「左傾」而是「右傾」，正確的路線應當是比他更左，就是所謂「純粹的無產階級的路線」。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他離開了歐洲型而根據他自己對於中國的鄉村的了解來行動。這裡引用劉少奇的一段話：「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亞洲形式，馬克思和列寧是歐洲人，他們用歐洲文字寫歐洲的歷史與問題，很少談到亞洲或者中國；無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能運用於世界任何民族和國家的；但是要把這種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仍是一種很困難的工作。毛澤東是中國人，他分析中國問題，指導中國人民的鬥爭走向勝利，他用馬列主義的原則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實際問題。他在這方面是第一個成功的人。」

於是，第三次的錯誤，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長征中舉行的會議裡，被糾正過來，中國共產黨才在毛澤東領導下，從苦難中慢慢的長大起來。

在抗日戰爭中，京滬撤退，武漢正受着嚴重的威脅時，中國大多數人對最後勝利正感絕望，有少數人主張作孤注一擲，大規模的反攻，如果失敗，也得來個速戰速決。而執政者蔣介石的意見，則模模糊糊。有時他談論迅速的反攻；有時又明顯地等待着英美蘇參加戰爭。毛澤東正在這時，發表了他

第一本影響黨外思想的著作，——「論持久戰」。他說：戰爭將成為三個階段：一、日本侵入，在這時期，中國正規軍將後退，但在敵後將進行游擊戰。二、長時期的「相持」階段，其久暫及殘酷性，視中國力量的團結程度及國際情況而定，但在此期間，中國的抵抗終將削弱日本的力量。三、勝利的反攻。這本書在當時為中美軍事專家們所看重，而日本人亦譽之為遠東最偉大的戰畧家。在今日看來，卻不像預言，而卻像歷史。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又寫了一篇「論新階段」，特別指出「相持階段」應和衷共濟，共禦外侮。

一九三九年，國內的悲觀與失望，一天一天在增長，國民黨困居重慶，一點也不抗日，日本對重慶的蔣介石，也不理會，而集中掃蕩華北及沿海各地。國民黨人甚至與日本勾通，國家前途的危險，莫過於此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於一九四〇年寫成了「新民主主義論」。它曾是一聲號角，他說中國並不是沒有希望。他分析了勝利之路，早日勝利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最能領導人民到達勝利及戰後繁榮的政府的形式。不是國民黨獨裁，不是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政府，不是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的舊形式，而是一個「新民主主義」，一個所有革命階級的聯合政府。隨後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又發表了「論聯合政府」一書，這本書，可以說是「新民主主義論」的續篇。

「新民主主義」在中國革命思想中，劃出了一個轉捩點，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完成為自一九四〇年以來所有一切的政策的基础。對於世界思想的影响，蘇聯的評論家認為它是一本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不僅適用於中國，更適用於相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從這讀實看來，很可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影响了戰後歐洲所出現的各種政府形式。

毛澤東對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世界形勢，雖然未曾有所著述，但在一九四七年中共為新年而發佈的文告中，分析得很清楚：『全世界的民主勢力，由於反法西斯的世界戰爭的勝利，是在迅速而巨

大的發展中。這個民主勢力是在世界規模上被反民主勢力所進攻，世界反民主勢力的中心堡壘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在其他資本主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中，反動派成為賣國賊，把各國人民的利益，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蔣介石則是一個標本。因此，民主勢力為民主權利與較好生活而進行的鬥爭，變成了也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以爭取他們各民族的獨立的鬥爭。

『因此，一個世界規模的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綫就會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它的成長，表現於東歐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英法的左傾與德、意、日、人民的左傾潮流，以中國為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人民鬥爭的生長，拉丁美洲民主力量的發展，美國的罷工與「華萊士事件」。比起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任何衝突來，這些才是世界上緊迫的鬥爭。蘇聯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支柱」，但並不直接參加這次緊迫的鬥爭。』

毛澤東有了這樣一個世界觀在心裡，我們再讀一讀他在一九四七年元旦所發表的祝詞內的最後幾句：「……中國人民這個統一的意志，將肯定地壓倒任何反動集團的意志；從而使各黨派間恢復誠意的和平談判，並使全國範圍內真正的和平路綫為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大地。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一定會在今後數年內奠定穩固的基礎。」這些話，現在已經開始實現了。這就是毛澤東的偉大！

五、毛澤東自傳

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父親的名字是毛仁生，母親未出嫁時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親是一個貧農，在年輕的時候，爲了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他當了很多年的兵。後來，回到了就是我生下來的鄉村裡，做小買賣和一些別的事業，克勤克儉，稍稍積集了一筆小小的款子，他便買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從這幾畝田上，我們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計，這樣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積餘。用這一點剩餘，我父親又積蓄一筆小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田，這樣一來我家就成了「富農」了。那時我家每年可以有八十四担谷的收入。

當我只有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田地的時候，家中的五個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一個弟弟和我。我們增加了七畝田地的時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個小弟弟。可是我們依舊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積餘，這樣我的父親慢慢地發起來了。

當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他開始做販運谷米的買賣。用這種方法，他又賺了一些錢。當他成了富農之後，他繼續這樣買賣，而且作爲主要事業，用去了大部分的時間。至於田地的管理，則僱

了一個長工，此外再叫孩子和妻子都到地上勞動。當我六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做田地上的工作。我父親並不開商店，他只是從貧農們那裡把谷米收買下來，轉售給城裡的商人，如此他賺到了錢。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時候，他便添僱一個短工，所以在這個時候，喫飯的人便增加到七個。我們喫得很省，但終是喫得很飽。

當我八歲的時候，我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校裏讀書。在那裡我一直讀到十三歲。早上和晚間我在田間工作。白天我讀孔子「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頑固派，粗獷而嚴厲，常常痛打學生。爲了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我不敢回家，因為怕挨打。我莫名其妙地走向縣城去，以爲縣裡是在某處的一個山谷裏。瞎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裡找到了。我這纔知道我這次旅行，只是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這許多時候，還沒有離開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形有點改善了。我父親的暴厲態度，比從前稍微好一點，而教師也溫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動得到如此的結果，使我深受了影響。這是一個勝利的「罷工」啊！等我學會了幾個字之後，我父親開始叫我記家裡的帳，並且叫我學習打算盤。因爲我父親固執着要我學這些事，所以在晚上，我就開始學習這些東西了。他是一個很嚴厲的教師，對於我的懶惰，常常表示厭恨。假如沒有帳記的時候，他仍叫我到田間去工作。他爲了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們。關於錢這樣的東西，他不給我們，而且給我們吃最不好的東西。每月十五日，他對於他的工人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和飯吃，可是永遠沒有肉。對於我，則既無肉，又無蛋。

我母親是個和善的女人，寬厚而富於情感，永遠願意把家中的所有分給別人。在飢荒的時候，她可憐那些窮人們，常常送米給他們。但當我父親在面前的時候，她不能這樣做，因爲他不贊成慈善的。關於這一件事，我家裡常常發生口角。

我們家裏分爲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在朝的執政黨。我，我的母親，我的兄弟，有時候甚至工人們所組成的，是在野的反對黨。可是在反對派的「聯合戰線」上，意見不能一致。我母親主張

「間接打擊」的政策。她反對任何明顯的情感的表現，也不讚成對統治力量的公開反叛。她說，這不是中國人的辦法。

但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方法，便是引用經濟或是用父親自己的話，作為我自己有力的辯護。我父親慣用不孝和懶惰兩種罪名來責備我。我却引用經書上的話來說服他，說父慈則子孝。說我懶惰，則我用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的話來反駁。我說他年紀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應該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的力量要比他大得多。

這個老年人——我的父親——繼續「積聚財產」，後來大家竟稱他為這個小鄉村裏的大財主。他不再用購買的方式來增多土地，却接受了許多別人田地的抵押。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我對於他的不滿繼續增高。在我們家庭裡，辯證法的鬥爭是始終不斷的發展着。（註）我特別記起一件事。當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來。正當他們還在的時候，我們兩人發生了爭論。我父親當着大家的面，責備我，說我貪婪懶惰。這事觸怒我了。我責罵他，而且要脫離家庭。我母親跑着追我，竭力勸我回去。我父親也勸我，可是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了一個池子旁邊。用自殺來要挾，說若是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投水。在這種僵局之下，為了停止內戰起見，雙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賠罪，作為求饒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許不打我，則我可以跪一隻腳磕頭。於是戰爭便在這樣的條件下停止了。從此我知道了，當我用公開反叛的方法來保護我的力量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寬和些了；反之，當我保持馴善服從的時候，他只是罵我打我更厲害。回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用嚴厲態度作為教子的政策失敗了。我學會了去仇恨他，我們反對派真正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去對付他。因為這樣總是對我有利。如此之後，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快地記帳，他也沒有批評責備我的口實了。

〔註〕毛氏追述到這些事，老是愛用這些幽默的政治術語，來當做說明，一邊大聲笑着。——史諾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字，記帳一事是足以勝任的。我母親是目不識丁的。他們兩人都是從農家出身，所以我成了家庭裡的「學者」。我讀會了經書，可是不喜歡經書。我最喜歡讀本國的傳奇小說，而對於那些叛變的故事，則尤其喜歡。我讀過「岳飛傳」、「水滸傳」、「反唐」、「三國志」和「西遊記」。那時候我還年幼，是在我的老教師謹慎提防之下偷讀的。我的老教師恨這些閒書，認為都是壞書。我常常在把這些書帶到學校裏去讀，當老師走過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牠們掩住。我的許多同學也都這樣做。有許多這樣的故事，我們幾乎都能背誦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討論，像這種故事，我們所知道的比鄉村裏的老人還要多。他們也愛聽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們互相交換講述。我相信這些書對於我後來影響很大，因為這些都是在記憶力強盛的年紀裏讀的。

最後，我離開了小學，其時我是十三歲。我開始整天在田間幫助僱工工作，白天做一個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間就替我父親記帳。可是我還能夠繼續讀書，除了經書之外，我一有機會，就吞嚥一切我所能找到的東西。這時使我父親很懊惱，他希望我能熟讀經史，特別是在他有一件訟案失敗了之後。事實是如此的，他的對造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適當的經典，結果他敗訴。我常常在半夜裏，把我房子裏的窗戶遮掩起來，使我父親看不見燈光。就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盛世危言」，這書我非常喜歡。這書的作者們，是一些老式的改良主義者，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缺乏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汽船等等。他們想介紹這些東西到中國來。而我父親却以為看這些書籍，是徒然費時曠業。他想我學一些經書一樣的實用東西，可以使他在訴訟中得到勝利。

我繼續閱讀本國的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一件事，就是：不知為什麼，在這些小說裏面，沒有關於種田的農民們的事蹟。所敘述到的人物，不外是些戰士，官吏，或者文人；永遠看不見一個農民。對於這一件事，整整有兩年，我得不到解答。後來，我把小說的內容加以分析。我發現了：小說裏面的人物，是著名的武人，人民的統治者，他們都不必從事操作，因為他們土地的所有人，很明顯地是有着農民們在代他們工作的。

我的父親毛仁生，早年中年，都不是一個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親，却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訓給予她的孩子，而我們也會對於父親的不相信神表示焦慮過。當我還只九歲的時候，我會經和母親鄭重其事地把我父親不相信神的問題加以討論。那時和那時以後，我們用了許多方法想勸醒他，可是結果失敗。他只罵我們，我們受了他攻擊的威脅，只好讓步，另想別法。但是他總是不願意和神們有所往來。

可是，我所閱讀的書籍，開始慢慢地在我的思想上發生影響，我自己也慢慢地對神的信仰開始懷疑了。於是我母親爲我憂慮，責備我對於宗教儀式的不虔誠。可是我父親毫無表示。後來，有一天，他出門去收賬，在路上，他遇見了一隻老虎。這老虎膽膽他，忽然慌張地逃跑了。可是我的父親更覺得驚恐了。事後，他對於這次神秘的脫離，總是不能忘懷，從此以後，他開始虔信佛教了，並且常常燒香點燭，但是對於我的與日俱增的無神論，仍然置之不問。只是當他遭遇困難的時候，自己向神明祈禱。

「盛世危言」使我發生了恢復學業的願望。對於田地上的工作漸漸感覺到厭倦。我父親當然反對我。我們常常爲了這件事而爭論，最後我脫離了家庭。我走到一個失了業的學法律的學生的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又追隨着一位中國老學者，讀了些經史古籍，也讀了許多時務文章和其他新書。這時，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那事情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活。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校外面，我們學生看見了許多巨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爲什麼都離開了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裏面的一件大事變的始末。

那年有一次嚴重的饑荒，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流爲餓殍，災民們派了一個代表向撫臺衙門請求救濟。但撫臺粗暴地回答他們說：「爲什麼你們沒有飯吃？城裏多得得很呢，我常常喫得很飽的！」當人們聽到了撫臺這樣的答覆，他們怒了，隨即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並且發動了一個游行示威。他們攻打滿洲衙門，斬斷了作爲官廳的標誌的旗杆，逐走了撫臺。事後，戶部派了一位姓張的大員，騎馬

出來，曉諭人民，說政府正在想法幫助他們。很明顯的，這個姓張的約言，的確是很誠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歡他，責備他和「亂黨」勾結。於是斥了職。接着來了一個新撫臺，立即下令逮捕事變的領袖，許多的人被梟首，掛在旗杆上示衆，作爲對將來「造反者」的一種警告。

對於這件事變，我們在學校裡展開了好幾天的討論，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們，對「謀反者」表示同情，但他們都只是一個旁觀者的觀點來看。他們不明白這是對於他們切身的生

活有密切關係的。他們之感覺興趣的原因，只是因爲這是一件驚人的事變。我却覺得「謀反者」們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民，所以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

不久之後，韶山的哥老會（註）和一個地主之間發生了一種衝突。這個地主到法院裡去控告他們。因爲他很有勢力，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敗訴了。可是他們不但屈服，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個叫做劉山的山裡，建築了一個強固的根據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並且散佈謠言，說哥老會舉起反叛之旗的時候，曾經殺了一個小孩子去祭旗。反叛者們的領袖，是一個姓龐的鐵匠。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龐鐵匠被迫逃跑，後來，他終於被捕，殺了頭；可是在我們學生看來，他確是一個英雄，因爲我們都同情這一次的造反。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裡糧食異常恐慌。窮人們向富農要求幫助，他們開始了一種「喫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糧食雖然恐慌，可是他仍然從我們鄉裡把大批米谷運到城裡去。他運出的一批米被窮苦的鄉民劫去了，於是他忿不可當。我對他不表同情。可是同時我對於鄉民們的方法也不滿意。

這時，在我們本地的小學堂裡出現了一個「維新派」教員，對我思想上產生了一種影響。他是「維新派」，因爲他反對佛教，要想驅除神和上帝，他勸人民把廟產興學。他是一個遭受指謫的人物，我讚佩他，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在我年青的心靈上，留着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我的心靈早已是反叛的了。

在這個時期中，我也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特別是在我讀過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問題的小冊子以後。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這本小冊子開頭就是那麼一句：「嗚呼，中國覆亡有日矣！」它敘述日本如何佔領高麗、臺灣、和中國在安南、緬甸等地方主權的喪失。在我讀到了這些話的時候，我對於祖國前途，覺得非常可憂。我開始認識了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民的天職。

我父親已經決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裡去當學徒，這家米店他很熟識。在起初我並不反對，覺得這或者會是很興味的事。可是後來，我聽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新學校，我便不管我父親的反對，決意要到那裡去。這學校是在湘鄉縣我外婆家所在的地方。我的一個表弟是那裡的學生，他告訴我這個新學校和新教育的改革情形，那裡注重經書，而注重西方的新學。教的方法，也是很「維新的」。我和我的表弟一同到那裡去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人，因為我誤以為這個學校是專為湘鄉人開的，後來，當然發現了這學校是不限籍貫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貫。在這個學校裡，我繳了一千四百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及書籍用品費。最後我父親對於我進這個學校的事同意了，因為許多朋友，竭力主張這個學校可以增加我的賺錢能力。這是第一次我走到離家五十里路遠的地方。那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學校裡，我開始讀到了自然科學和一些西方學問的新科目。另一個可注目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位教員是日本留學生。他戴着假辮子，可是很容易看出那辮子是假的。人們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有這許多兒童們在一塊。他們大都是地主們的子弟，穿著很值錢的衣服；農民們能够供給子弟們到這樣的一個學校是很少的。我穿戴比別人寒酸，我只有獨套的較為體面的衣服。學生們不穿大褂，只有教員們纔穿，而西裝則只有「洋鬼子」纔穿。許多潑氣學生都看不起，

〔註〕就是智龍曾經加入過的秘密團體。——史諾

因為我平常穿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可是我也有濶氣學生做朋友，有兩個同伴特別知己。這兩個之中，有一個是現在已成爲作家，住在蘇聯。

我不被人喜歡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校裡，湘鄉人是很關重要的。而屬於湘鄉的某鄉則更重要。湘鄉有上、中、下三鄉，而上下兩鄉，爲了地域關係，總是不斷地鬥爭。這一鄉的人不肯與另一鄉的人並存。我在這一個鬥爭的局面裏嚴守中立，因為我並不是湘鄉人。結果三方面的人都瞧不起我。我覺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這個學校裏，我進步很快。教員們都喜歡我，特別是那些教古書的教員們，因為我寫得一首好古文。但是我却無心於經書。我正是讀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報，敘述着康有爲的維新運動。一種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我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我崇拜着康有爲和梁啟超，對我的表兄非常感激——那時候我以爲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一個反革命者，土豪劣紳階級的一份子，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營壘。

許多學生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爲了他的那個假辦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講述關於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還記得幾句美麗的句子：

「小雀唱，

夜鶯舞，

春天的綠野是可愛的呵！

石榴紅，

楊柳綠，

彷彿是一張新的圖畫。」〔註〕

在那個時候我只感覺到日本的美，在這個歌裡感覺到日本戰勝帝俄的一些驕傲和威力。我沒有想到竟會有一個野蠻的日本——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一樣。

這便是我在「假洋鬼子」那裏所學的一切。

這時候，我纔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兩人都死了——雖然新皇帝宣統（現在的溥儀）已經統治了兩年。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君主制度的人；實在，還認為皇帝以及官吏們都是很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只要康有為維新的幫助。我那時埋頭讀古史，對於堯、舜、秦皇、漢武等的政績大為嚮往。那時候我又讀了一些外國史地。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論文裡，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一名詞，裏面有這樣的句子：「在八年的艱苦戰爭之後，華盛頓獲得了勝利，建立了他的國家」。在一本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崙、喀德琳女皇、彼得大帝、威靈頓、格蘭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

〔註〕這首詩歌，顯然是日俄戰爭終了之後，春天的慶賀勝利宴會中所唱的。——史諾

第二章

長沙時代

我開始想要到長沙去。這是一個大城，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二十里之遙。聽說這個城是很大的，裡面有許多許多的人，許多的學校，以及撫台衙門。總之，牠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候，我很想到那裏去進一個專為湘鄉人設立的中學。在那一年冬天去我請求我的一個高等小學校里的教員介紹我到那裏去，他允許了。我步行到長沙，非常地興奮，又怕也許會不准我進去，根本不敢希望我真會變成這個大的學校裏的學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無困難地進去了。但在政治急變的形勢下，我在那裏只住了半年。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這是一種民族革命的日報，登載着廣州反封建的起義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難。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發動的。我被這故事深深地感動了。覺得「民立報」充滿了富於刺激性的材料。這報是由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變成一個著名的國民黨領袖。在這個時候我也知道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綱領。國家這時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暗夜。我高興得如此，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我的政治意見，是寫得很混亂的。還沒有放棄我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的崇拜。並且也不十分明瞭他們中間的不同。所以我的論文裏，我主張應該把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召回來就任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做國務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

反對外國投資運動，因了川漢路的建築而開始發動了。同時，人民對於立憲的要求普遍地傳播着。皇帝對於這個回答，只是下旨設立一個咨政院。在我的學堂裡的學生愈來愈趨激烈了。他們用反對豬尾巴（辮髮）的手段來表示他們排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把我們的豬尾巴已先行剪去，但別一的

些起先答應也要剪去的人，到後來都遲疑地反悔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而且後來用強迫手段把他們的辮子剪去，做我們的剪子的犧牲者有十餘人之多。這樣子，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一躍而為主張取消一切辮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變人的觀點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個在法學學堂的朋友發動了對於豬尾巴（辮子）故事的大辯論，雙方都提出相反而對立的論據。這個法律學生以經書為辯論的根據，堅持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但我自己和其他反對者，站在排滿的政治立場，提出了一種反對的理論，駁得他們體無完膚。

在武昌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發生之後，湖南宣佈了戒嚴令，政治局面變換得很劇烈。有一天一個革命黨，得到了校長的允許，到中學堂裏來，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講。在大會上，七八個學生站了起來，對滿清加以猛烈的攻擊，擁護他的主張，並且號召建立民主國家。大眾都全神灌注地靜聽着。當那個革命的演說家——黎元洪的一個官吏——在被激動起來的學生前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面，差不多連呼吸的聲音都停止了。

聽了這一次演說之後四五天，我決定要加入革命軍。我和幾個朋友從同學那裏集了一些錢，決定到漢口去。聽說漢口的街道是很潮濕的，非穿雨鞋不能行走，我就到一個在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皮鞋，這軍隊駐紮在城外，我被駐防的軍隊攔阻住了，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緊張，兵士們已經發給子彈，他們正向市街開過來。

叛軍已經沿着粵漢鐵路道線前進，戰爭爆發了。長沙城外，發生了一次大戰。同時城裏面起了一個叛變，城門被中國工人攻佔。我得了其中一個工人的援助，得以進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個高地上去觀戰。直等到我看見了「漢旗」在衙門上飄揚——所謂漢旗也者，是一塊白布中間，有一個「漢」字的布旗——我才回到校裏，其時它已經在軍隊守衛之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府組織了起來。哥老會裏兩個有名的會員被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是設在以前省諮議局的房屋裏，議長是譚延闓。原來的省諮議局被取消了。在革命者所搜查出來的滿清文件

護，有幾件請求召開國會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書成的。徐氏現在已經六十歲了，現在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那時候他把他的手指斬斷，以表示他的誠懇的決心。他的呈文的開頭是下列兩句話：「請求召開國會，余敬同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斷指告別。」

新都督和副都督都存在的時期很短，他們倆並非壞人，的確頗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於是地主和商人對他倆表示不滿。沒有幾天之後，當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兩個人的屍身躺在街上。譚延闓對他們發動了一個有組織的叛變，原來譚氏是湖南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

這時候，有許多學生投軍，一隊學生軍已經組織成功，在這些學生軍裏有唐生智。我不喜歡學生軍，牠的基礎太混雜了。我決定改變方針參加正式軍隊，真實地幫助革命。那時候清帝還沒有退位，所以這個戰鬥時期還得相當長久。

我在軍隊裏的餉銀是每天七元——可是這已經超過我現在在紅軍裏所得的餉銀了。還七元錢，我按月用去二元伙食，我還要買水。因為兵士必須要到城外去挑水進來，但是我是學生出身，不願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買水用。我把餘下來的錢，都費在報紙上，我對於讀報一件事，簡直有些兒瘋狂。鼓吹革命的報紙有「湘江日報」，裏面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在這欄中，第一次學習了這一名詞。我也和別的學生們和兵士們討論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只是社會改良主義而已。我讀了一些江亢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的小冊子，我很熱心地寫信給好幾個同級的同学，討論這一問題，可是他們中間，只有一個寫回信給我，並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隊裏，我最喜歡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其餘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於有一個是流氓。我曾經勸說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營長以及士兵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我能寫，讀過不少書，他們對於我的「大學問」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革命到這時還未定局，清朝還未完全放棄政權，而在國民黨中，却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人

們都盼湖南免不了要爆發第二次的戰爭。有許多的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反對袁世凱，湖南軍隊也是其中之一。可是當湖南人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覺得革命已經過去了，就決定退出軍隊，回到書本上去。我只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正有許多學校在開辦起來，而以報紙為媒介，吸引新的學生。我對於學校的好壞沒有一定標準來評判，對於進什麼學校也毫無主見。可是當我投考以前，我見了一個「肥皂製造學校」的廣告，不需要什麼學費，供給膳宿，並且還稍有津貼。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廣告，它說了許多關於製造肥皂如何與社會有利的話，說它會如何能富國利民。於是我便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學校的方針，而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那裏也交了一塊錢的報名費。

在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設了一個法政學校，他催促我進他的學校。這個法政學校，我也讀到了它的一則誘人的廣告，這廣告預約著許多美妙的事情，牠允許在三年中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知識的學程，並保證三年畢業之後，學生會立即變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在我面前讚美這個學校，直到最後我寫信給家裏，把廣告上所預約的一切複述一遍，請求他們寄學費給我。我把將來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對家裏描畫成一幅光明的圖畫。我就在法政學校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一方面等候著我父親的回信。

命運又由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形式來攔阻我了。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議，說國家現在正是在經濟戰爭之中，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專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也在這個商業中學裏付了一元的報名費，結果我投考而且被錄取了。可是，同時，我還繼續看廣告，有一天我讀了一則廣告，她說一個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好處，這是由政府主辦的，課程很豐富，聽說教員們也都很能幹。我決定了最好是能在那裏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以後寫信給我父親告訴了我的決定。他很高興，我父親是素來讚美經商的。我進了這個學校，只住了一個月。

我發現了我和這個新學校之間有困難存在，因為那裏有許多功課的教授是用英文的。我和許多別

的學生不同，英文程度甚低，簡直只知道字母。覺得這種局面是很討厭，便在一個月的末尾退了學，我又繼續翻閱廣告。

我第二次的學業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用一塊錢報名，經過了入學考試，發榜時以第一名錄取。這個學校很大，學生很多，畢業生也是很多的。那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愛好文學，所以很喜歡和這位教員接近。這一位教員借一部「御批通鑑」給我，這部書裏面有乾隆皇帝的聖旨和御批。

正在這個時候，長沙的官辦火藥廠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們學生都覺得這件事新鮮有趣。群幾噸的子彈和炸彈都爆發了，火藥燃燒起來變成一片很強烈的火焰，比起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一個月以後，譚延闓被袁世凱所驅逐。袁氏那時正操縱着民國的政治機搆。湯壽潛代替了譚延闓，而他開始替袁氏籌備登基。

我對於第一中學不大喜歡，牠的課程限制得很嚴，規則也是一無足取。在讀了「御批通鑑」以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如果我自己讀書自己研究，也許對我更為有益。六個月以後，我便離開了學校，自己排了一個自我教育課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裡去讀書，我對於這件事很規矩很認真。在這樣的方法之下所耗去的半年，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的，每天早晨當圖書館開門的時候，我就進去，在正午的時候，我僅僅休息片刻，去買兩個糕餅吃，算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圖書館裏，直到牠關門才出來。

在這個自我教育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了世界地圖，並很有興趣地加以研究。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原理」，和一本「穆勒名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莎的「群學肄言」和一本孟德斯鳩寫的「法意」。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於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我把他們胡亂混在一起了。這時，我冒充了湘鄉縣人，住在同鄉會館裏。有許多兵也住在那裡，都是些從縣裡退伍的或被解

散的兵士，他們毫無事，而且都是很窮。在會館裏學生和兵士常常吵架。一天晚上，這種怨仇爆發，繼之用武。兵士攻擊學生，並且想打殺他們。我躲到廁所裏，直等到衝突結束以後纔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我的家裏不肯供給我，除非我進學校。又因為我不能夠再在會館裏住下去了，便開始找尋新的住所。同時我正在認真地思索我的前程，認為我最適宜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一則很神人的廣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興趣勃勃地研究他的好處：不需要學費，膳宿費也很低廉等等。我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去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試驗的論文。我把我的計劃，寫信告訴我的家庭，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允許。我替我兩位朋友寫了論文，自己也寫了一篇，給與三個人都錄取了——所以，實際上，我錄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以為我為朋友捉刀的行爲，並不是不好的，只是一件友誼事情而已。

我在師範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對於後來一切的廣告的引誘，不再注意。最後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生活中遭遇了不少的重要事情，而在這個時期中，我的政治觀念也開始形成了。在這裡我把在社會行動中的最後的經驗學會了。

在這個新學校裡有許多規矩，而我對於這些規矩贊成很少。我反對自然科學定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對於自然科學，我特別不感興趣，我不願意讀，所以在這些課程裏，我得到的分數都很少。我所最恨的是靜物寫生的必修課程，以為這是極端愚蠢的事。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畫的最簡便的東西，很快地畫完了就出教室。我記得有一次畫了一條直線，上面加了一個半圓，說是代表李白詩「半壁見海日」一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說這就是蛋，自己認為滿足了。圖畫這門課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課程都很好，所以一平均我的別種低級分數都給扯過了。

這裏的一個中文教員，學生們替他起個綽號叫「袁大鬍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說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瞧不起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經是我崇拜的人。我被迫只好改

變我的文章作風。我就閱讀韓愈的文章，學習了舊的古文辭藻。所以，敬謝葉大猷子，假使是需要的話，我今天還能够寫出一篇可觀的古文。

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英國留學生楊昌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的是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決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把一種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灌輸給他的學生們。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本關於倫理的書，是蔡元培翻譯的。我讀完了這本書之後，寫了一篇論文，題名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我的論文很受楊昌濟老師的稱讚，他給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觀點來批評的。

一個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的「民報」看，我讀牠的時候興趣極為濃厚。在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的綱領。有一天我看見「民報」上登載着兩個中國學生徒步旅行中國一直到了西藏邊境打的打箭爐的事，這件事非常地鼓勵着我。我想要摹倣他們，但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應先辦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於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遊歷湖南省，走遍了五縣，和我在一起的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我們走遍了這五縣，不費一文錢。農民們供給我們喫食，供給我們睡覺的地方；我們足跡所至，都受很好的招待與歡迎。這個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後來成為在易培基手下的一位國民黨官吏。易氏那時就是湖南師範的校長，後來成了南京的高級官吏，他替蕭瑜謀得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監守的職位。蕭瑜竄竄了博物院裏一些最寶貴的寶物，在一九三四年拐款潛逃了，現在他在大連藏身。

爲了感覺到要向外發展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伴侶不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到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能耐艱苦有決心而能爲祖國犧牲的條件。後來，我收到了三封半響應的信。一封是羅章龍的回信，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封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寄來的。那所謂半封回信，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

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番話之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圍聚集了一群學生，這群學生後來就是新民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對於中國的國事和命運，有着廣大的勢力。它是一小群態度極為認真的人，絕對不討論身邊瑣事的。他們所說所做，必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來談情說愛，而且認為時局是太危急了，學問的需要是太逼切了，要討論女人或私人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我對於女人不感興趣，在我十四歲時，我父母替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同居過——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承認她是我的妻子，而在這個時候，我一點兒也不想念她。關於女人的「媚人」的討論，在那時候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有重要的一頁的，可是我的同伴們不僅不討論這個，即使是日常生活普通事情，也拒絕討論。我回憶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裏，這位青年對我談起要買些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的僕人喚來，向僕人討論了半天買肉的事，纔叫他去買一小片肉，我心裏非常不安，以後就不再和這位青年見面了。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

我們也成了熱烈的體育鍛鍊者。在冬季假期裡，我們在田野裡走着，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河過江。假如遇見下雨，我們就把衣服脫下，說這就叫「淋浴」。當太陽很熱的時候，我們也把衣服脫下，說這就是「日光浴」。在春風裡，我們大聲叫着，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遊戲。已經下了霜的日子，我們還要露宿，甚至於十一月裡，我們還在冷水裏游泳。這些一切都是在「鍛鍊身體」這一個名詞之下進行的。也許這件事對於我的體格，的確有不少幫助，因為後來我在華南許多次的進退行軍之中，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裏，受賜匪淺的。

那時候，我和許多在別的鄉鎮城市裡的學生和朋友們，組成了一種很廣大的通信關係，慢慢地我開始覺得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別的朋友，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這七八十人中，有許多人後來都變成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經加入過新民學會的較為著名的共產黨員有：羅邁——現在黨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第二方面軍

裏面：何叔衡——中央蘇區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槍殺；郭亮——有名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槍殺，蕭子璋——作家，現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槍殺；葉立雲，中央委員，後來叛變投降國民黨，變成資本家工會組織者；蕭鍾，黨的著名領袖，黨成立時最初綱領的六個簽名者中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學會會員的大多數，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槍殺了。

大約在同時，另一團體組織成功了，這是湖北的社會福利社，是類似新民學會的一種組織。牠的許多會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其中有：惲代英——該社社長，在反革命中被槍殺。林彪——該社社員，現任紅軍大學校長。同樣，張瀾——現任白軍工作負責人員。在北平也有一個會社，叫做五社，有些會員後來也加入共產黨。在中國別的地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漢口、天津，一些青年戰士，組織了好幾個急進的團體，開始在中國政治上確立了一種勢力。（註）

這些會社的大多數，多少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才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喜歡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梁、康二人，我早已拋棄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等思想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關於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等，我都有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確定地反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

於一九一二年考入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註〕這樣的團體，在天津的是覺悟學社，吸引一些急進的青年到這個組織裡來，周恩來是創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穎超女士——現在的周恩來夫人；馬鈞，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槍殺；孫肇俊，現任國民黨官吏——史諾。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當中，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許多次數的報名費也包括在內。從這個數目中我要把三分之一耗費在報紙上，因為通常定一份報紙，總是按月一元。我還常常在書攤子上買些書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這種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面。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沒有走上井崗山以前，我對於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種日報的閱讀，從未中輟過。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裏，母親死了。這樣我回家的興趣更加淡薄了。我決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時候是北京——去。湖南有許多學生都計劃着要到法國去，用「工讀」的方法去讀書。法國在歐戰中用這種方法招募中國的青年去為牠做工。在離開中國以前，這些學生預備在北平學習法文。我幫助把這種運動組織起來。在這一群出洋的學生中間，有許多是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後來都變成著名的急進分子。徐特立也受了這一個運動的影響，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員位置，跑到法國去，當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纔加入了共產黨。

我陪了一些湖南學生來到北京。可是，雖然我幫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還有補助，我卻不願意到歐洲去。我覺得關於國家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假使我把時間化在中國，那對祖國是更爲有利。那些決意要到法國去的學生，從李石曾——現任中法大學的校長——學習法文，可是我沒有，我個人另有計劃。

我在北平覺得費用太大，我是從朋友那裡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非馬上找尋職業不可。楊昌濟——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尋一個職業，他把我介紹

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殺了。李大釗爲我找到了工作，是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八塊錢——數目不算少。

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們都不屑和我接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瞧不起。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像傅斯年、羅家倫之類，我對於他們特別感覺興趣。我想去和他們交換一些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意見，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土語。

但是我並不失望。爲了要旁聽大學裏的功課，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在新聞學會我遇見了好幾個同伴，像陳公博；譚平山，他後來加入了共產黨，又一躍而成了所謂「第三黨」的一份子；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氏，給我很多的幫助。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充滿了熱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

當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的時候，我也遇見了張國燾；康白情——他後來加入了美國加利佛尼亞州的三K黨（「——」——更諸）；還有段錫朋——現在是南京政府教育次長。在這裏，我也遇見了而愛上了楊開慧女士。她是我從前的倫理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氏對我最有影響，並且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興趣繼續增高，我的思想也越加急進，這種情形的背景我已經在上面講過了。可是在這時候，我還是很悻悻，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到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小冊子很受了一些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北大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牠在中國的可能性。在那個時候，我讀到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另一方面，這座古城的美給了我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一間小屋子裡共有七個人擁住着。晚上我們七個人挨得緊緊地睡在一個炕上，挨得透不過氣來。當誰要翻身的時候，必須預先警告睡在兩邊的人。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廣場上，我

對於北方的早春，生了嚮往之情。當北海上面正結着堅冰的時候，素色的寒梅盛開着，楊柳枝頭懸掛着冰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使我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天珠玉樹的名句：「千樹萬樹梨花开」。北京的無數的樹木，喚起了我的好奇和讚美。

一九一九年之初，我要到法國去的學生一同到上海。我的錢只够買到天津去的車票，到了天津以後，我就沒有辦法向前進了。可是，正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的，有一位同學從北平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够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經洗過腳的那條小溪邊，也到了聖人渡他的幼年生活的小鎮。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顆古樹，相傳是孔子手植的，靠近後代爲他所立的歷史上有名的廟旁邊，我居然看見了這顆樹。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個弟子——顏淵所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並且也去拜訪了孟子的生長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神聖的山，馮玉祥曾在這裏隱居而且寫過些愛國的對聯的。

可是當我到了浦口，我又分文不名了，沒有車票，更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如何能離開浦口。可是禍不單行，車上，一個賊又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噫呀！怎麼辦呢？但是，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遇着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薩」。他借給我買鞋子以及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的錢。這樣我安全地到達了我的旅途——同時，對於我的新鞋特別當心了。上海我知道已經有一筆款子募集好了送學生到法國去，同時，爲我還預備了一筆錢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們上了輪船之後，我就向長沙進發。

我所記得的，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紀念的旅行是這些：

我在北海溜過冰，曾經繞洞庭湖走過。又在保定的城牆上繞着走了一圈。在「三國誌」裏有名的徐州的城牆，以及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繞過一個圈子。最後我登過泰山，謁孔墓。這些事情，在那時我覺得是徒步遊湖南以外的有價值的成績。

當我回到長沙的時候，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為積極。五四運動之後，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學生政治活動上面。我主編「湘江評論」，一種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還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都猛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壞透了的人。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他去職，並且派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那時孫中山在那邊已經很活動——鼓動反對他。於是張敬堯禁止了「湘江評論」的出版作為學生反對他的一種報復行動。

此後，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發動了一種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鬥爭擴大而為普遍的反軍閥的運動，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策進這個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是得到相當成功的。張敬堯被譚延闓所推倒，在長沙建立了一種新的統治局面起來。正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分裂而成了兩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堅持一種更遠見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裏，我又遇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之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還大。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曾經去訪拜他，請他贊助湖南的學生運動。在上海和陳獨秀討論關於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然後我回到湖南開始着手組織。在那裏我覺得了一個教員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裡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綱領——意思是真正的自治。對於北方政府非常不滿，相信假使能够和北京脫離關係，那末湖南的現代化當更為迅速。所以我們的團體竭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裂。在那時是美國的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堅決的擁護者。

譚延闓又被軍閥趙恆惕逐出湖南了。趙恆惕以湖南自治為號召，達到攫取他私人利益的目的，他假意擁護自治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一種主張。可是當他一攫取了政權之後，卻用着大力壓制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贊成一種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綱。我們在自己辦的「新湖南報」上，公開鼓吹這種改革。有一次，我們領導了一次搗毀湖南省議會的活動，省議會的大

爲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後一次——的圍剿，蔣氏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採取最新的戰術和戰略，在第四次的圍剿中經他的德國顧問們的建議，已經開始採取封鎖和碉堡制度。在第五次圍剿中，他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他用他的軍隊，實行嚴厲的封鎖，整個包圍了蘇區，他很小心地前進，建築汽車路，碉堡和戰壕，避免把他的主力軍隊接近紅軍，他們謹慎地在防禦工事後面作戰，他們只作短距離的前進，並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掩護着。

在這一時期中，我們犯了兩個重要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叛變中，沒有能和蘇廷錯聯合，第二個錯誤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了錯誤的單純防衛戰略。在陣地戰上，迎擊廣大侵越的白軍，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這種戰爭上，紅軍的技巧和精神都是落後的。

這些錯誤的結果，加上蔣氏圍剿的新的戰略和新戰術，以及白軍的驚人的數目，和優越的技術，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乃不得不改變牠在江西的情形了。其次，民族的政治情形，影響了整個局面，迫使我們決定將主要活動遷移到西北去。隨着日本的進攻滿洲和上海，蘇維埃政府已於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對日宣戰。這宣言爲了白軍封鎖包圍着蘇維埃中國而不能實行。接着牠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所有的武裝軍隊結成聯合陣線，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在下列三個條件之下，願意和任何的白軍合作：（一）停止內戰，停止對蘇維埃與紅軍的攻擊；（二）保障民衆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權利；（三）武裝民衆舉行抗日戰爭。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中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於蘇維埃都城瑞金，舉行了革命成績的檢閱。在還會議上，我提供了一個長長的報告，就在還會議上，選舉了現在這一批蘇維埃政府委員。不久以後，我們開始準備長征。這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正是蔣氏發動他最後一次圍剿的一年以後。在這一年中，差不多毫無休止地作戰和爭鬥，雙方都遭受到很重大的損失。

一九三五年正月，紅軍主力部隊，達到了貴州遵義。接着而來的四個月中間，紅軍不斷地向前行

但沒有佔領。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後，直到西北長征開始，我自己把我的時間，差不多全部在用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軍事的指揮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們。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了第四次，——也許是最慘敗的一次——圍剿，〔註〕在這一期間的第一次作戰中，紅軍繳了兩師人的械，俘獲了兩個師長，第五十九師的一部份被消滅，而第五十二師，則完全消滅。這次作戰是在僅僅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頭一戰中，紅軍就俘獲了一萬三千人的白軍。國民黨的第十一師，——蔣氏最精銳的部隊——幾乎等於全部消滅，差不多全部繳械，牠的師長又受了重傷。這一次作戰，有決定全局的力量，第四次的圍剿隨即告終。蔣氏當時寫信給他底前敵總指揮陳誠，——認為這次的失敗，在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贊成這樣急速地推進軍隊的，他那時候對人說，從他意見看來，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的任務」，而且是一種「無期的徒刑」。這話傳到蔣氏那裡，就把他革去了最高指揮的職位。

〔註〕關於對蘇維埃區域征討的次數，在反共戰爭的許多記載上說得非常紛歧。有些作者，總計圍剿的次數有八次之多，可是這幾次南京的大動員中間，有若干次，純粹是自衛性質。紅軍指揮官們，只說有五次主要的反共圍剿。這五次中，南京軍隊直接參加作戰的人數大概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人數十萬；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人數二十萬；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人數三十萬；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人數二十五萬；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人數四十萬，（動員了九十萬人以上，進攻三個主要的蘇區。）在一九三二年中，南京沒有發動大規模的征剿，但是那年蔣介石在紅色區域的四周動用了約十五萬人的防禦。這反是紅軍大舉進攻的一年。顯然，一九三三年的白軍防禦戰，因為被當作反共「圍剿」來宣傳，就被許多作者誤解為大圍剿了。共產黨並不這樣地加以討論，蔣氏也一樣——更諸。

僅僅休息了四個月以後，南京又在何應欽的最高指揮之下，開始第二次圍剿。兵力超過了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那時一般認為紅軍的情形是很不利的。蘇維埃政權所管轄的區域很窄狹，財源有限，設備簡陋，而白軍的物質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過紅軍。可是，迎擊這次的進攻，紅軍仍舊握住牠以前賴以取勝的戰略。讓白軍深入蘇區，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攻擊他們的第二路，擊敗了他的好幾旅人；消滅了他們的進攻能力。接着我們很快地接連攻擊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擊退了他們。第四路沒有作戰，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卒被殲滅。在十四天之內，紅軍作了六次戰爭，進軍八天，以決定的勝利結束之。其六路被擊潰和敗退之後，由蔣光鼐、蔣延黻指揮的第一路軍，沒有經過重大的戰爭就撤退了。

一個月後，蔣氏自己指揮着三十萬大軍，來作肅清「赤匪」的最後努力。他有最有能力的指揮官幫助他，像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等，每人都負責一主要路線前進。蔣氏希望用一鼓佔領蘇區急速地把「赤匪」蕩平。開始一天八十里的行軍，深入到蘇區的中心。這供給了紅軍最有利的作戰條件，不久就證明蔣氏戰略的嚴重錯誤。主力只有三萬人，輔以一連幾次的機警的游擊戰，在五天之內攻擊了五股不同的白軍。在第一次戰爭中，紅軍俘獲了許多的白軍軍隊，大批的軍火槍械和其他設備。到九月裡蔣氏第三次的圍剿證明失敗了，在十月裡便把軍隊撤退了。

這時候，紅軍進入了一個比較和平發達的時期，勢力擴張得很快。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了，中央蘇維埃政府也組織了起來，我被選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在同月裏，發生了寧都大暴動，國民黨的第二十八路軍有二萬以上叛變了來加入紅軍。這些軍隊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氏後來在江西陣亡，董氏則今天仍是紅軍第五軍司令，紅軍第五軍是從寧都暴動的軍隊產生出來的。

紅軍現在開始他自己的進攻了。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一次大仗，佔領了這個城池。南方則在南雄擊敗了陳濟棠。在蔣氏的陳線上，則大舉攻佔樂安、黎川、建寧、泰寧等縣。一度攻打贛州，

前，軍隊發生了一個危機。第三軍團的一部分，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和其他軍隊脫離。可是彭德懷竭力和這種傾向鬥爭，在他指揮之下的軍隊保持了團結，服從最高當局的意志。但是由劉德超領導的第二十軍，公開起來反叛，逮捕了江西蘇維埃主席，逮捕了許多軍官和政府官吏，根據李立三路線，對我們作政治的攻擊。這事發生在富田地方，稱為「富田事變」。富田是靠近那時的蘇維埃區域的中心吉安縣的，所以這件事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許多人看起來覺得革命的命運，就靠這一個鬥爭的結果如何而定。幸而這叛變，不久就被壓平了，這全仗第三軍的忠誠，黨和軍隊的團結，以及農民階級的擁護。劉德超被捕了，別的反叛者也被繳械肅清了。我們的路線重又建立了起來，李立三路線被確實鎮壓下去了。結果是蘇維埃運動以後得到了偉大的勝利。

但是這時，南路方面已徹底明瞭了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勢力。在一九三〇年之末，開始了向紅軍舉行第一次圍剿。白軍的總數超過十萬，開始包圍了紅色區域，在魯滌平的總指揮之下，分五路進攻。紅軍那時能動員的軍隊，總數約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動戰略，迎擊並克服了這一次的圍剿（註），得到了很大的勝利。沿用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略，以主要軍力，向每一個單位分別攻擊。我們讓白軍深入蘇區，然後用超越的人數突然對這些孤立的白軍，集中兵力攻擊，我們獲得了便利游擊的地位，包圍他們，這樣把數目遠過白軍所享受的軍事優勢，逆轉過來。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擊破了。我相信假使紅軍在這次圍剿開始以前不能成就三個條件；這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三個條件是：（一）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之下，團結起來；（二）李立三路線的清算；（三）黨對A B團（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劉德超等）以及其他在紅軍中和蘇區裏的積極的反革命份子的勝利。

〔註〕從這些土地上所得來的租金，在大革命時期中，毛氏曾用來進行湖南的農民運動。——史諾。
〔註〕關於這一次圍剿，楊壽所著的「中國的共產黨現狀」一書（一九三一年南京出版）寫得很詳盡。

妻子和我的妹妹，我兩個兄弟——毛澤民、毛澤覃——的妻子，以及我的兒子，都被何健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槍決了，其餘後來得到了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伸張到我自己鄉村的裏，因為我會聽見人家講，說當地的農民，深信我不久就要回到我自己的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天空飛過，他們一定說裡面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正耕種着我的田地的人，說我要回來視察我的田地，來看地上的樹木有沒有被伐。假如伐去了，我一定會要求賠償的。

但第二次攻擊長沙之舉，失敗了，大批的援軍開到城裡，防衛得甚為堅固；九月間，外加有新軍隊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第一次圍攻中，只有一次重要的戰爭，這一役紅軍消滅了兩旅白軍。可是紅軍不能爭得長沙，幾星期後，便向江西撤退。

這次的失敗，促成了李立三路線的傾覆。阻止了紅軍去攻打武漢而免遭損失——這是李立三要求的。那時候紅軍主要的任務是招募新兵，新的農村區域的蘇維埃化，而最主要的是在佔領區域裏，徹底鞏固蘇維埃的政權。在一種綱領之下，攻擊長沙，顯見是不需要了，而且這種攻擊的本身，就含有冒險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在佔領作為一種暫時行動，並不企圖守住城市，建立國家政權，那麼這種努力，也許可以認為有益的，因這在革命運動上所產生的反應是很大的。當蘇維埃政權在後面還沒有穩定的時候，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這是一種軍事和戰術上的錯誤。

但是李立三那時候把紅軍的軍事力量和本國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估計得太高了。他相信革命將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掌握全國的政權了，他這個信念，是被那時候正在進行的蔣介石與馮玉祥兩人之間的長期而喪元氣的內戰所鼓勵，表面上看來，彷彿是對李立三十分有利的。但是依照紅軍的看法，他們是正在準備對蘇維埃大舉進攻，只要內戰一停止，他們就會發動。所以紅軍應該加緊戒備，決無餘暇來從事那可以得到慘敗的賣動主義和冒險主義。這一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在湖南方面失敗了，紅軍退回江西，特別在吉安佔領以後，紅軍裏的「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立三自己，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立即在黨裏失去了勢力。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

地散開。這意思是要避免陣地戰，而用一切方法去迎擊在行動中的敵人隊伍而殲滅之。在這種戰術上，紅軍的驚人的活動力和敏捷有力的「突擊」力發展出來了。

在擴大蘇維埃區域這一點上，紅軍的綱領是主張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而不主張採用不穩定的跳躍式推進方式，以至在佔領區域裡沒有深強的穩固力。這種政策很合實用，正如上面所說過的戰術一樣。他是從多年的集體的軍事與政治經驗中得來的。這些戰略，李立三激烈地反對着，他主張集中一切武器於紅軍手裡，並吸收一切的游擊部隊。他喜歡攻擊，而不喜歡穩健；喜歡前進，而不喜歡保守後方；喜歡對大城市加以聲勢浩大的攻擊，輔以暴動與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操縱了黨與蘇區以外的地方，勢力很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足以迫使紅軍，違反臨陣經驗而去接受他。這路線的一個結果，是對長沙的攻擊，另一結果，是向南昌的進軍。但是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不願停止游擊的活動，而把後方暴露給敵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移到江西北部，攻擊並且佔領了許多城市，給予白軍許多打擊。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第一軍團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前進，在這一次的進軍中，第一軍團匯合了彭德懷的部隊，彭德懷部隊曾經一度佔領過長沙，但為避免為強大勢越的敵人軍隊所包圍，是被強迫撤退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懷不得不離開井崗山，在江西南部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部隊。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聯合了朱德和紅軍的主要部隊。經過了一度會議之後，決定彭德懷的第三軍應在江西、湖南邊境活動，而朱德和我則向福建推進。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三軍和第一軍團重行建立了聯繫，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第一和第三軍團合併了成為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我為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之下，我們達到了長沙城外。

大約在這時候，中國工業革命委員會組織成功了，我被推為主席。紅軍在湖南的勢力是很普遍的，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我的名字在湖南農民中很有名，國民黨政府為要捕獲我，不論殺死或活捉，曾懸了很大的賞格，朱德和別的紅軍領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註）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

一九二九年初，有幾隊在李文龍、李韶九領導下的游擊隊，被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由黃公略任指揮，朱瑞任政治委員。同時朱培德的一部分民團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由一個國民黨司令羅炳輝領導着，來投共產軍的。這一位羅司令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加入紅軍，現在他是紅軍第二方面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游擊隊和正式的紅軍幹部，組織成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仲豪任指揮，譚震霖任政治委員。後來伍仲豪在戰爭中陣亡而由羅炳輝接任的。

就在這個時候紅軍第一軍團組織成功了，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治委員。牠包含了山林彪指揮的第三軍，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黨的領導權交付給前敵委員會負責，而我是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第一軍團已經有了一萬人以上，編成了十師。除了這支主力軍以外，還有許多的地方的獨立旅，赤衛隊和游擊隊。

對於軍事之勝利的發展，除了這一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之外，紅色戰略也很有關係。我們在井崗山上採取了四個口號，這四個口號供給了紅軍藉以生長的游擊戰術所採的方法的總線索，這些口號是：

- (1) 敵進我退！
- (2) 敵止我擾！
- (3) 敵退我擊！
- (4) 敵退我進！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的經驗，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大致說來，紅軍放棄了這種戰術，就不能勝利。我們的軍隊是很小的，敵人的力量要強過我們十倍至二十倍；我們的財源和軍火也是受限制的，只有巧妙地混合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纔有希望在反對白黨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他們是有廣大的資源和優越的基礎來作戰的。

紅軍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戰術，不論現在或將來，是在攻擊中能集中牠的主要力量，而以後，

第六章

紅軍之成長

慢慢地紅軍對於群眾的工作改進了，紀律嚴謹了，在組織方面的新技術也發展了，各地方的農民階級開始自動來幫助革命了。在井崗山時代，紅軍已經叫士兵們堅守三條簡單的維持紀律的規則，那是：（1）迅速服從命令；（2）不許沒收窮苦農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從地主階級沒收而來的物品立即直接交給政府處置。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爲了要獲得農民階級的擁護起見，曾作重大的努力，在上面所歷舉的三條以外，又加上八條規則，這八條是：

- （1）離開一家人家時，把門板（睡覺用）放在原處。
- （2）把你們睡時所用的草蓆捲好交還。
- （3）對老百姓要溫和和客氣，隨時幫助他們。
- （4）一切借用的物件都要歸還。
- （5）一切損壞了的東西都要賠償。
- （6）和農民交易要規矩。
- （7）買東西要付錢。

（8）要講衛生，廁所要設在離人家很遠的地方。

最末兩項是林彪所添加的。這八項實行的成績日見進步，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軍紀，牢牢记着，常常能背誦出來。另外還教三項別的責任，作爲紅軍的基本目的：第一、對敵人要抵抗到死；第二、把群眾武裝起來；第三、要募集款項幫助鬥爭。

一種弱點，反映着缺乏紀律，誇張民主觀念和組織的渙散等等。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土匪性質」——不肯安靜下來，認真去做政府指派的工作，好動、好新、好事、此外還有軍閥主義的遺留，有些司令官虐待甚至鞭打士兵，還個人的好惡，對部下妄加軒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駐在福建西部的紅軍第四軍舉行了第九次會議之後，許多弱點都被克服了。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改善的方法，釋除了許多誤會，採用新的方法，這在後來奠定了紅軍高級意識形態的領導基礎。在這以前，上面所說的那些傾向，是很嚴重的，而且被黨和軍事領導中的托洛茨基派分子，利用了來破壞這一種運動的力量。對於這種壞的傾向的一種猛烈的鬥爭開始了，有幾個人因此被取消了黨裡的地位和軍事指揮權，其中以劉恩康——一個司令，為最好的例子。一度發覺他們企圖把紅軍領到抵抗敵人更為困難的地位上去的一種方法，破壞紅軍，幾次失敗之後，他們的陰謀明顯地暴露了出來。他們竭力攻擊我們的綱領以及其他我們所贊成的一切。經驗證明了他們的錯誤，他們被免除了職位，福建會議之後，他們的勢力完全消滅了。

這次會議，準備了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道路，下一年就有了一些光明的勝利。江西南部，差不多全部為紅軍所佔領。中央蘇維埃區域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集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蘇維埃未來的綱領。出席的份子是本地的黨、政、軍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土地政策經過一次長時期的討論，對於機會主義——由那些反對重行分配土地的人們所領導的——的鬥爭戰勝了。會議又決定實行重行分配，加速組織蘇維埃。到那時為止，紅軍只是組織了地方和縣區的蘇維埃。在這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一個新政策，農民報之以熱烈興奮的擁護，這擁護在幾個月以後，幫助紅軍擊敗了白軍的圍剿。

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由張鼎承、鄧子恢（等）主持組織了蘇維埃。

、（傅柏翠（後變成社會民主黨）

在井崗山「反對冒險主義之鬥爭」時期中，第一軍擊退了白軍兩次爭奪山寨的企圖。井崗山的礦是我們所要創造的一種活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牠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所產的穀物，足夠維持小小的軍隊。它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本地名稱是叫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小山，已經早已放棄了）。這是從周圍五個大井得名的——大、小、上、下、中五個大井，在山上的五個村字，就跟着這九口井而命名的。

我們的軍隊在井崗山會合之後，重行改編了一次。有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總司令，我是政治委員。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健的部隊暴動轉變以後，井崗山又增加了許多軍隊，紅軍第五軍就從這些部隊中產生出來，總司令是彭德懷。除了彭以外，還有鄧平（在長征貴州巡邏遇害），黃公略（一九三一年在廣西被殺），和滕代遠。

來了這些軍隊以後，山上的情形變得很壞了，軍隊沒有冬天的服裝，糧食也非常稀少，有好幾個月我們差不多靠吃紅薯過活。士兵呼喊着他們自己作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紅薯！」——在他們看來，所謂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紅薯。把彭德懷留在井崗山上，朱德衝破了白軍的封鎖陣線。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此告終。

這時候，第四軍開始打通江西南部的鬥爭，發展得很成功。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本地的紅軍會合了聯合起來。我們把軍力分開繼續向永定、上杭和龍岩進發，在這幾縣裡，都成立了蘇維埃。在紅軍未到以前，在這些區域裡舊有的武裝民衆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很快地建立在這一種穩定的基礎上。靠了農村群眾運動和游擊戰，紅軍的勢力伸張到幾個別的縣分，但是共產黨則到後來纔完全握到這權力。

紅軍的情形在物質與政治方面都開始進步了，但還有不少壞的傾向。譬如說：「游擊主義」是

(一)分配土地，(二)建立蘇維埃。我們想把群眾武裝起來，加速這些步驟。我們的政策，主張自貿易，寬大地對待被俘虜的敵人部隊，一般地來說，是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天，井崗山上召集了一個代表會議，到會的是井崗山以北的蘇維埃代表。關於上面所說各點，蘇區裏的黨代表中，意見還是很分歧。在這次會議中，各種不同的意見是充分地發揮出來。少數人說：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很狹窄，大多數人，則相信我們的政策會成功。當議決案提出來，並且說明蘇維埃運動將來如何會得到勝利的，議案是很容易地通過了，可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准這一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開會報告書到達了井崗山的時候，這批准才算接到了。

在這次會議裏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此以後，黨的領袖中，和在農業區域裏的蘇維埃運動的領袖中意見上的不協調，總消除了，黨的一致重又建立了起來。

第六次會議的議決案，綜合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和秋收暴動的種種經驗，下了贊成對於土地運動應該重視的結論。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別的地方發展。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這些暴動奠下了新蘇區的基礎。在四方的賀龍，和在東方的徐海東，開始組織他們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也加入了。一九二七年冬，方志敏和邵式平在江西的東北部沿福建邊界，也開始了一種運動。這後來就發展成爲一個有力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彭湃率領了一部分忠實的部隊，到海陸豐組織了一個蘇維埃，可是因爲接受了盲動主義的政策，不久就被消滅了。不過，它的軍隊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揮之下，離開那區域，與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絡，後來成了紅軍第十一軍的基本隊伍。

一九二八年春天，游擊隊在李文龍、李紹祖領導之下，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一帶活動。這一個運動，以吉安周圍爲根據，這些游擊隊，以後成了第三軍的中心幹部，而吉安本縣，則成了中央

因為秋到暴動的綱領沒有得到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又因為第一軍遭受了一些嚴重的損失，又從城市的角度來看，這種運動無疑是要失敗的，所以中央委員會這時候決定排斥我。我的政治局與前敵委員會的職位均被免職。湖南省委會也攻擊我們，稱我們是「槍桿子運動」。可是我們還是把軍隊在井岡山團結着，十分相信自己所走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也充分為我們証明了。新兵參加了，這一師人又補充了，我擔任了總指揮。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在井岡山打定了基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湖南邊境茶陵地方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完成；牠的主席是杜仲賓。在這個蘇維埃中，我們實行了一種民主政綱，採取一種遲緩而能正常發展的溫和政策。這樣，井岡山得到了黨內貧動份子的青睞，他們要求一種恐怖政策，焚抗殺戮地主來喪他們的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戰略，所以頭腦熱烈的人就稱我們為「改良主義者」。他們對我攻擊最烈，因為我不採行一種較為急進的政策。

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的土匪的領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加入了紅軍。使紅軍實力增加到將近三旅之衆。王袁都被任命為旅長，其時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經投降過國民革命軍，現在他們準備對反動勢力作戰。當我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倆可算是忠實的共產黨信徒，執行着黨的命令。可是後來，當他們單獨被留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回復了土匪脾氣，結果是被那時已經組織化蘇維埃化的有自衛能力的農民們所殺害。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到達了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合了。我們共同起草了一個計劃，組織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慢慢地把共產勢力在湖南、江西、廣東邊境各縣中；穩定團結起來，以此為根據地，再向更廣大的區域發展。不過，這個策略是與黨的建議相衝突的，因為黨有着急速發展的偉大理想。在軍隊裡面，我和朱德要同兩種傾向鬥爭：第一種是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為是「冒險主義」；第二種向南撤退到廣東邊境，這我們認為是「收退主義」。那時候，我們所看到的主要工作有二：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在安源礦工和農民保衛隊之間奔走的時候，我被與國民黨通聲氣的一些民團捕獲了。那時候恐怖手段正達到牠的最高點，整百的有嫌疑的紅黨被槍決了。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槍決的。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想賄賂押送人員釋放我。普通士兵都是唯利是圖的，我的遭受槍決，對於他們沒有特別利益，他們已經答允釋放我了，可是負責的隊長不肯。所以我決定打算逃脫，不過直到離民團總部不過二百碼的地方，我纔得到了脫逃的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把繩子扭斷，逃到田野裡去躲著。

我走到一個高地方，在一個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長得很高的草，在那裏我躲著直到日落。兵士們搜尋我，並且強逼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我。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碰得到他們了。可是我始終沒有被發覺，雖然有五六次，我認為已經無望，覺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獲了。到後來，黃昏到了，他們不再搜尋我了。我馬上出發，爬山越嶺，整夜地跑著。我沒有鞋，腳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了一個農民，他待我很好，允許我借宿，後來又領導了我到鄰縣。我身邊還有七塊錢，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保衛隊那裏的時候，袋裏只剩兩個銅板了。

新軍成立之後，我擔任了黨前敵委員會的主席，武漢衛戍司令俞希濤擔任第一軍總司令。俞氏多少是受他部下逼迫而勉強出來擔任的；不久以後，他背叛了紅軍，參加了國民黨。

這支小小的軍隊，一面領導農民暴動，一面向南移動穿過湖南省。他必須擊破千萬的國民黨軍隊的防線，打了許多次的仗，收退了幾次。紀律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在士兵和長官之中，有許多動搖份子，有許多逃兵。俞氏逃走後，軍隊到達寧國，便又改編了一次。陳灝被任命為留守部隊——約有一旅之衆——的指揮；可是後來，他也叛變了。不過在第一隊裏有多數人，自始至終忠實不渝，直到今天他們還在紅軍裏——如羅榮桓，第一軍團政治委員，楊榮生現為紅軍司令。當這一小隊，最後爬上井崗山的時，人數只剩一千名左右。

第五章

新政權運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賀龍、葉挺領導之下的第二十軍，和朱德合作，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動，這就是紅軍組織的開始。一星期後，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開除了陳獨秀的書記職務。我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會議以來，一直是黨政治局的一員。對於這個決議，我是主動的。在這次到會的其他十個人之中，有蔡和森、彭孔德和瞿秋白。黨採行了新路線。一切和國民黨的希望，是暫時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十足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再負起民主革命的責任來了。合作長期的政治權力的公開鬥爭就此開始。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稱為「秋收暴動」的這個運動。我在那裡的計劃，是要實現下列五點：（一）省黨部完全脫離國民黨，（二）組織工農革命武裝隊伍，（三）沒收中、小、大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共產黨的勢力，和國民黨脫離關係，（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在那時候為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牠纔把這一點提出來作為口號。

當九月間，以湖南的農民協會為出發點，在發動普遍的暴動上，我們已經成功了。工農軍隊的基本單位也已成立。入伍者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瀘陽礦工，和國民黨軍隊中的譁變部隊。這早期的革命武裝隊伍，被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其中第一旅是由安源礦工組成的。第二旅是由平江、瀏陽、醴陵以及湖南另外兩個縣分裡的農民保衛隊組成的。第三旅是由叛棄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隊的一部分組成的。這一支軍隊組成，是得到湖南省委員會的准許的，但湖南省委員會及我們的軍隊的一般綱領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那時候的中央委員會只是一種觀望政策，並不積極反對。

運動，他們稱農民協會爲「流氓協會」，認爲它的行動和要求都太過火。陳獨秀把我從湖南調開，認爲我應對湖南所發生的那些事情負責任，並且猛烈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南京和上海開始舉行了對於有組織的工人們的大屠殺，廣州也實行了同樣的舉動。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事變，好幾千個農民和工人被槍殺。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和共產黨的合作，把共產黨份子從國民黨裡以及武漢政府裏驅逐出去，可是這武漢政府不久也消聲匿跡了。

這時候，許多的共產黨領袖們接受黨的命令離開中國，到俄國、上海或別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請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省委書記，可是十天以後，他又急急地下令我回來，責備我組織反抗唐生智的暴動。唐那時是武漢的統治者。黨務在這時候混亂不堪，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最後，武漢國共合作的崩潰，促成了陳獨秀領袖的沒落。

共聯合陣線重行確立之後，我又到上海，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這年五月由蔣介石領導召開的。我在上海負責主持共產黨的農民部，從這裡又被派到湖南去視察那邊的農民運動。同時，在國共兩黨的聯合陣線之下，在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歷史上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視察了五縣——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做報告給中央委員會，催促在農民運動裡採行新路線。次年早春，當我到了武漢的時候，舉行了一個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我出席提出建議，主張普遍把土地重行分配。在這一次會議上，有彭湃、方志敏和兩個俄國共產黨員——約克（York）及窩隆（Vodan），決議接受了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五次大會討論，可是中央委員加以否決了。

當共產黨中央第五次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還是在陳獨秀操縱之下。雖然那時候，上海、南京開始向共產黨進攻，可是陳獨秀還是抱溫和態度與武漢的國民黨互相妥協，而且抑制了各方面的反對，採行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那時候，我對於黨的政策非常不滿意，特別是關於農民運動一方面。我現在想起來，假使那時的農民運動，能更徹底地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對地主鬥爭，那麼革命力量也許能進一步而更有力在全國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竭力反對。他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並且把農民革命在這時候的可能性估計得太低。結果，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的第五次全會，不能通過一種完美的土地政綱。我的農民運動應該加速深入的主張，甚至沒有提出討論，因為那時的中央委員會為陳獨秀所操縱，拒絕提出來考慮。全體議決以「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這樣就把土地問題擱開了。用這一個地主的定義，想發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完備而沒有事實根據的，而且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土地經濟的特殊性。可是，會議之後，一個全國農民協會組織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不管共產黨對牠的態度如何萎縮，和國民黨對牠如何蔑視，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高級長官和軍隊司令們開始要求鎮壓這種農民

顧問也從蘇聯來了。國共的聯盟開始領導普遍全國的革命運動。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抱病，回湖南休養，可是回到湖南以後，我把本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組織了起來。

在從前，我還沒有充分了解在農民中階級鬥爭的程度，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及接着的政治運動的大浪潮當中，湖南農民的鬥爭性極十分明顯。我離開我在養病的家，開始農村組織工作。在幾月之中，我們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民協會，惹起了地主們的仇恨，他們請求當局逮捕我。趙恆惕會派軍隊追尋我，我便逃往廣州去。我到那裡，正是黃埔學生戰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廣西軍閥劉震寰的時候，廣州城市和國民黨內部充滿着樂觀的空氣。正當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

我擔任了「政治週報」編輯，這是國民黨政治部的喉舌。牠後來在攻擊和批評戴季陶所領導的國民黨右派，有很活動的勢力。我又負責擔任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工作，並且為這種目的開設了一班訓練班，由二十一個不同的省分的代表來參加聽講，其中有從內蒙來的學生。來廣州不久，我擔任了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其餘林伯渠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黨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很多。在共產黨內，擔任農民工作的特別任務，根據着我的研究和我在湖南組織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做「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另一本叫做「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裡所發表的意見。那本書主張一種急進的土地政策和在共產黨內加緊農民組織。陳獨秀拒絕由共產黨中央機關發行這一本小冊子。這本冊子，後來在廣州「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是在湖南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行的。大約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不滿意。我們慢慢地分離了，雖然我們中間的鬥爭，要到一九二七年纔達到最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一次政變為止。在國民黨左右兩派協調，國

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莫斯科的發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別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時是書記——已經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包含礦工、鐵路工人、僱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等。那年冬天，一個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了。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而在農民中做的工作很少。大的礦廠的大部分工人，而學生則幾乎是全部被組織起來了。在學生與工人兩方面都有好幾次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槍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基，結果是引起了對於趙恆惕的一般的公憤。被槍殺的兩個人是在這一件事件中，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是援助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組織湖南省總工會。可是我們對無政府主義者妥協，經過磋商之後，阻止了他們所幹的許多躁急而無謂的行動。

我被派遣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趙恆惕運動。第二次黨大會，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開會，我本想要去參加的。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錯過了機會。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動工會的工作。下一年春天，湖南發生了幾次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與承認工會的罷工，大部分都勝利了。五一勞動節湖南全省舉行一次總罷工，而這次罷工，表明了中國的工人運動，已經到達了空前成功的地步。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舉行的。通過了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建立了反抗北洋軍閥的聯合陣線。這時我到了上海，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我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的第一次全代大會。三月裏回上海，一面担任共產黨黨部的工作，一面又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執行委員，除我之外，還有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同工作，調整國共兩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將軍來任顧問，別的蘇維埃

第四章

國民革命時代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在這個組織中間的重要領袖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人都是中國最有名的知識界領袖。當我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我對於這方面的興趣的發展，陳獨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我會經和陳獨秀討論過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而陳的堅決的信仰在我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對於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

在上海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十二個人。那一年的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而我是委員之一。接着在別的省分和城市也組織起來。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會裏有陳獨秀、張國燾、楊明齋、譚平山、陳公博、劉燕青、殷秀松、施存統、沈玄盧、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殺）、李達、李森等。在湖北的黨員有項英、鄒代英、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學校主席）、許白昊、施洋。在山西的黨員有高宗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的是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別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彭湃（一九二九年上海被殺）。王俊美和鄧恩明是山東支部的發起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學生們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牠的成立差不多是和在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開始的，那裡的黨的發起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是發起人中唯一的女子）。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發起人。在德國也有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時間稍遲一些，黨員有

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所派的地主豪紳。這一次暴動的結果，是把省議會裏所張掛的充滿着胡說亂道和吹牛的詞句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搞政省議會這件事，被認為是湖南的一次大事變，把那些統治者們都嚇住了。可是，當趙恆惕握得了政權，他竟背叛了他以前所倡議的一切主張，反而特別猛烈地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學會把攻擊的目標轉向他。我記得，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學會發起了一個慶祝聯十周年革命三週紀念的示威運動，這示威被軍警鎮壓了下來，有些示威者曾經試想在會場升起紅旗來，可是被軍警所禁止。示威者指出依照當時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但是軍警們置之不理，他們說他們不管什麼憲法不憲法，只知道執行趙省長的命令。從這次以後我漸漸相信只有由群眾行動得來的群眾政治力量，纔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為目的把工人組織起來，並且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北遊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近況的書，並且熱烈地搜集一切那時候能夠找得到的中文共產主義的著作。有三本在我的思想影響特別大，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之後，便從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翻譯的，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恩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侯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地在實踐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以後，便自認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同年，我和楊開慧女士結了婚（註）

〔註〕毛氏以後再沒有提到他和楊開慧女士的生活。從種種方面看來，他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他是北平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一個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動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是被當時湖南新青年所慶賀着，認為是「最理想的浪漫史。」這好像是由一種「試婚制」開始的；而很明顯地他們彼此是很專愛而忠實的。後來，楊開慧女士被槍殺了，這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事。——史諾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0/12/08 : CIA-RDP82-00457R0049006200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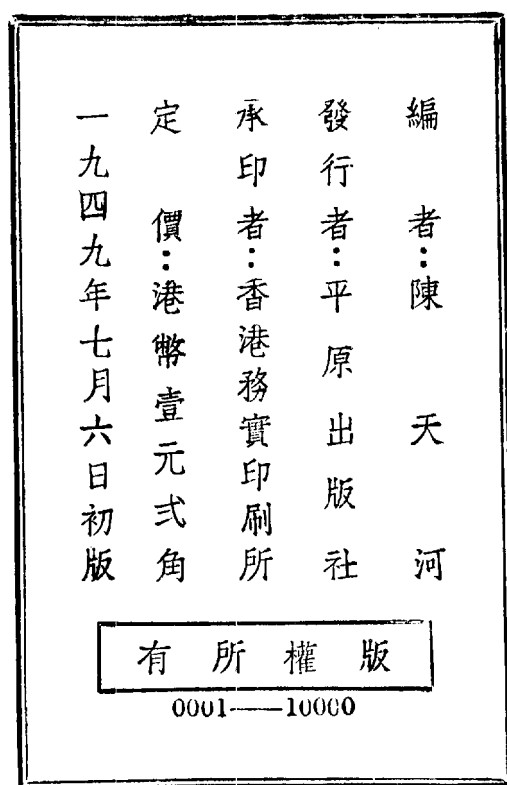
STAT

東
方
紅

發行
者：香港
務實
印刷
所

STAT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0/12/08 : CIA-RDP82-00457R0049006200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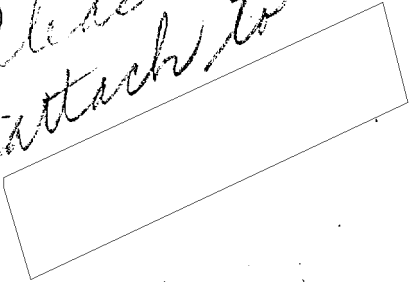


進，並舉行了最猛力的搏鬥和戰爭。經過了許多的困難，渡過了中國最長最深而最危險的河流，爬過了一些最高而最崎嶇的山道，經過了兇猛的土人區域，穿過了曠無人烟的大平原，受盡風暴雨雪，被全中國白軍軍隊的半數所追逐，經過了一切自然障礙物，和當地的軍隊作戰，衝過了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陝西，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西北部，在中國的大西北，擴大了現在的根據地。

紅軍勝利的長征，到達了甘肅、陝西，而沒有損傷主力，是有兩種原因的：第一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的領導，第二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基本構成份子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和超人的忍耐力與革命的熱情，中國的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永遠的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繼續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鬥爭。在這種決心之中，牠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最後的決定的勝利獲得了解釋。

牠的不可征服的另一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常平常的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穡、彭德懷、羅邁、鄧發、項英、徐海東、曹雲、林彪、徐向前、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還有許多已把生命獻給革命的人們，——他們都為同一目的而工作，創造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以及今後新起來的別的許多人們，定會把這一個運動領導着，達到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們正企圖在中國造成一個統一戰線，請求各黨各派，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及有誠意抗日的各軍隊，和我們聯合起來，擔當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務。為了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為了救祖國，造成這一種戰線，和建立徹底的中國民主政治，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也正和黨和紅軍的工作和目的一樣，此後要盡全力以赴，以期達到這一目標！

TRANSMITTAL SLIP		
SEP 5 1950		
DATE		
TO: LIBRARY		
BUILDING	ROOM NO.	
REMARKS: <i>Please attach to</i> 		
FROM: O/FE		
BUILDING	ROOM NO.	EXTENSION

FORM NO. 36-8
SEP 1946

50X1-HUM